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乱世人生】	终生在阴影下挣扎的人	马云龙
【一家之言】	回忆我与董良翮的往事	孔 丹
【千秋功罪】	孔丹“天然”竟何如？	栗奇程
【往事非烟】	在秦城监狱的日子	阎明复
【劫后余波】	看文革如何影响80、90后心理成长	张鸣真
【亲历者言】	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选载之三）	陈楚三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乱世人生】

终生在阴影下挣扎的人

· 马云龙 ·

世界上对得失祸福规律最用心的是中国人，那些关于“祸福依伏”的成语就是明证；但是，在无常的祸福面前最无奈的也是中国人。

在“血统论”猖獗的阶级斗争年代，有个好的出身成分，应该是件让谁都羡慕的天赐好事，但是也有人因此一辈子生活在无法逃避的阴影下，我的同学郭某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大有一批学生突然悄悄地从学校里消失了，我们班就有三个。他们的共同点是出身成分好，郭某就是其一，他是响当当的工人出身。过了很久以后大家才知道，他们是被精心挑选出来，去执行“特殊任务”了。有的到国务院信访办、《人民日报》去“帮忙”，郭某去的地方最神秘——到《红旗》杂志社去当“通讯员”。那可是中央文革控制下的要害部门，最权威的“两报一刊”中的“一刊”，能到那里去混事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啊。

两年后，在学校开始毕业分配时，他们陆续回来了。郭某回来后悄悄地向我透露了一点秘密：这两年里，他是受命在北京和全国各地了解文革动态。其中他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打入了在北京钢铁学院成立的“五一六兵团”，并参加了1967年夏天这个组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召开的成立大会。后来，他将得来的情报写成报告，交给了《红旗》杂志社，并被转呈了中央文革。这就导致了后来的“粉碎五一六兵团”。在告诉我这个秘密的时候，他是有点自豪的，认为自己做了件好事。当时他还没意识到这会成为他一生倒霉的起点。记得他当时说过，这只是个学校里的群众组织，参加的人只有几十个，最多与外事口单位（如外国语学院）有些联系，并没有形成一个遍布全国的秘密组织。当年夏天，随着的头目张建旗等人被捕，“五一六兵团”已经销声匿迹了。

谁也没有想到（包括郭某自己），到了1970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大抓“五一六”的政治运动正式开始，并成了“一打三反运动”的中心，各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清查领导小组”，各级都成立了专案组。全国抓出的“五一六份子”竟达百万之众，被捕、被杀、被批斗和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

这时，最先发现并报告了“五一六兵团”的郭某，已经下放到辽宁省抚南县农村去插队劳动了。随着“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来临，围绕着这个插队大学生出现了一个奇观：来自天南海北的全国各地上百个“五一六专案组”接踵而至，排着队要找他取证，以确认当地所发现的“五一六分子”是否是真的——他成了鉴定“五一六”的“专业户”了。这种情况让抚南县当局警觉了：郭某是不是个大“五一六”？要不然为何全国的专案组都来找他取证？于是，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当地被清查的重点人物了。

一般大学生下放插队从一两年到三、四年不等，但郭某创造了一个记录：他在抚南县的插队长达九年——因为怀疑他是个大“五一六”，但又查无实据，于是就把他放在农村“内控”起来，直到1977年他提出申诉，县里才给他安排了工作。按说他的厄运到此应该算告一段落了——然而不，还是没到头。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我最后一次见到了他。他神色黯然地向同班校友讲述了自己的异样经历，说从此他在多个岗位上工作过，如当过县广播局的副局长，还进过市委组织部，但都干不了几天就被调离。后来让他到企业去，先后在水泥厂、化肥厂、化工厂担任过副职，还到新建的成人大学抚顺大学当过校长，最后到抚顺市人大当了个办公室主任……他说，不知是因为什么，干什么都不干不长，终于一事无成。

2001年11月，噩耗传来，郭某在市人大办公室主任位上因脑溢血而去世，时年五十五岁。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代表同班校友前去参加他的葬礼，走进了他那清寒的家——真可谓“家徒四壁”，两间工人区的简易住房，断了腿的沙发靠一叠报纸支撑着一角。两个女儿都没有工作。他夫人告诉我，他是被气死的：市人大把一件谁也不愿意干的工作分工给了他——清查领导干部的违规住房。他居然认真地严查起来，结果得罪了不少上司，受到沉重的压力和刁难，一气之下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

在追悼会上，一位他的生前好友，市委宣传部姓马的部长证实了他夫人的话。他说，郭某确实是个当地少有的正直清廉的好干部，群众评价极好。但是可惜一直不得重用。

“原因是什么？”我问道。

犹豫再三，他才低声说道：“为了准备悼词，我看了他的档案。上面有个‘限制使用’的限定。”

他还解释说：“大概还是因为‘五一六’那档子事吧。”

这是大学同班同学中出身最好的一个，也是最早辞世的一个。他叫郭从军，曾经和我住在一个宿舍，我睡上铺，他睡下铺。一、二年级时他整天抱着《资本论》和黑格尔哲学，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郭格尔”。谁也没想到，这个最早打入“五一六兵团”，并向党中央打了报告的人，他竟然在“五一六”的阴影下挣扎了一辈子，到死也没有逃出这个阴影……

〔马云龙，北京大学中文系63级2班学生，1968年12月毕业。〕

□ 来源：《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主编：王复兴

~~~~~  
【一家之言】

## 回忆我与董良翻的往事

• 孔 丹 •

今年3月23日，董良翻的儿子董绍新来到我的办公室，给我送出版的董老家书。我问及他父亲的病情时，他说正在用自己的骨髓来帮助治疗父亲的白血病，我还夸他是孝顺孩子。他父亲现在云南瑞丽疗养，情况尚属稳定。

昨晚，突然传来噩耗，董良翻已溘然长逝，不由错愕不已。他长我一岁，竟猝然辞世，令我怅然良久，扼腕叹息。除了怀念故人外，似是也在提示我辈，生也有涯矣。以下从我的口述史中摘取若干片段，以寄托哀思。

.....

西纠是有总部的，但总部里我们这几个所谓的头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称谓，没有谁是总指挥了，谁是司令什么的。不过我们有几个编号、排名什么的，我是1号，也不过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翻，大家也都不否认。

可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负责人，现在叫一把手，或者说就是四中出的组织者。西纠领导层的这个结构，不仅和四中地位有关，和陈小鲁、董良翻的性格也有关系。我则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学生干部的历练，不是一天两天的历练。所以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格局。

在西纠总部里，有几个组。其他人回忆说，西纠有宣传部什么的，这似乎不对，应当叫宣传组吧。有一个组织组，组织组是王向荣负责。还有一个后勤组，由赵胜利掌管。宣传组是秦晓负责，其实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真正动笔，特别是很重要的6号、7号两个通令是李三友为主起草的。

李三友的父亲文革前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当时实际上已经被打成北京市委的“黑帮分子”了。不过在我们的眼里，李三友还是自己人，所以让他发挥着幕后的作用。其实马凯也在里面帮着做了不少工作。我印象中，起草西纠的通令马凯也参与讨论了。

西纠总部设在育翔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我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文连是徐海东的儿子，那时是指导员。师大女附中那个连谁是头儿，我记不太清了，包括邓榕当时都参加了女附中连。

所谓一个连，不过就是几十个人。纠察连的任务就是住在总部，应付紧急情况以便集中行动。我们真正有组织的行动也就有几次，如在地质部和地院东方红冲突、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等。

.....

总理要求西纠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西纠又临时从西城区各个学校抽调了300多人，由董良翻、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不是从纠察连直接派去的，但也是以西纠的名义组织的。还有些是临时情况变化就临时调动，比如保护班禅大师等。

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那天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室，他召集铁道部、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包括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外号武大麻子，还有周荣鑫秘书长参加。他那次把我、陈小鲁、董良翻三个人也叫去一起开会。

会上周总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温和的形象，发了很大的火。我小的时候，因为父母的关系和总理很熟，从没见过总理发脾气。那天，他把武竞天叫起来一通数落，训斥他失职没做好工作。武竞天是副部长，也算我的父辈，他被叫起来，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样站在那里，很尴尬。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总理后来说：今天，我把西纠的红卫兵请来帮你的忙，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都不行，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所以他当场就决定让西纠把整个北京火车站接管了，让我们会后马上布置去做安排。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由董良翻、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工作量极大。董良翻带着很多西纠队员在那呆了很长时间，扎扎实实地在那儿分兵把口，吃没吃喝没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车站的事我只去看了一两次，看到大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着实感慨得很。董良翻、陈小鲁他们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

.....

我在监狱里呆了整整四个月，1966年12月23日我母亲去世当天我被拘捕。1967年4月22日列宁诞辰那天晚上，我被释放。

因为西纠问题被抓的，除了我以外，还有董良翻和栗寒生。当时把我抓起来，矛头所指显然是周总理。从四人帮迫害总理、老干部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阴谋。那时追查所及，指向了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徐向前、陶铸、余秋里、廖承志、王任重、何长工、吕东、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等等。中央文革希望从我身上追查出西纠的后台。以现在的标准看，我母亲为西纠提供了办公地点、交通工具、被褥，都够得上算是支持了，你想撇也撇不清。

我们这个楼道里有十九个号子，我住的是19号，20号是茅号，就是厕所。有一次放风的时候，我捡了根钉子。墙上有一个走烟筒的窟窿，看样子过去牢房里是放过炉子的。窟窿已经被堵了，我就用这个钉子慢慢抠，终于钻了个孔。

那些看守们没有想到，我可以通过与厕所之间墙上的这个孔，和监狱里其他18个号子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用写检查的纸，写上交流的消息，再卷成细卷，从孔里穿过去。在各个号关押的人上茅号时，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传递消息。

后来因为联动问题被抓进来的人很多，在我周边的号子里都有。通过这种情报交流，我知道了董良翻、栗裕的儿子栗寒生，还有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等都被抓进来了。通过这种方式，我知道了外边的很多事情，比如联动反中央文革的事等等。

我们这批人是在1967年4月22日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释放的。那天，我们都被点名带出牢房。那阵势，感觉很恐怖，有的人声音都抖了。有的女孩儿小声说，是不是要枪毙咱们啊？我在里头算是年纪大的，我还说了一句：放心吧，没问题，绝不可能枪毙咱们，放心吧！

我们往外走，走到一个操场，灯光很亮，停着几辆大轿车。本来我们还很有秩序的，后来稀里哗啦地就上了车。这百十来人分头上了几辆车，然后车就启动了。开着开着，一看，到了人民大会堂南门。我们下车就被带进去了。不知是哪个厅，里面都摆好了椅子。本来我跟董良翻走在一起，到里面就分开了，不知道谁都坐到哪里去了。

刚坐下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等，我能认得的大概就这几个人，都穿着军装，一下子就走进来了。他们坐在一排，刚坐下，还没正式开始呢，江青就说了一句：“哪个是孔丹啊？站起来我看看。”她拉着个脸，阴阳怪气的。我就站起来了，也没什么表情。她看了看说：“坐下吧。”然后总理就上讲话。

总理讲话，大概开场就是这么说的：毛主席讲了，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所以，你们有错误，也还是要出来继续革命，所以把你们都放出来。

总理说到中间的时候，叫到了董良翻和我。我们俩“哗”一下就都站起来了。总理说：“坐下，坐下，你们两个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们犯错误我也有责任！”

有人回忆，后面还有一句是说：西纠还是有功的。但我不记得了，而且我觉得当时总理说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这不等于直接承认自己是西纠后台了吗。

还有人回忆，说我当时就掉下了眼泪。我现在回想是没有，当时只是觉得总理那么讲，我心里面有点酸酸的，但是没有流泪。我不知道董良翻是不是有这个反应。

那天，康生也去了。因为历史原因，康生和我父亲的私交原来甚好，他对我更熟悉。总理、江青两次叫我起来时，他都看着我笑，但没有说话。这次接见的时光不长，总理就宣布：散会了！

当时，我感到这件事很突然。事后听说，彭小蒙当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信中谈到，联动的牛皖平等人都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不是反革命。他们只是对江青有意见而已，不应当将他们继续关押，因此强烈要求毛主席关注此事。

这封信辗转送到了毛主席手里，毛做了批示。就是总理传达的：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这才有了4月22日的释放联动，我也因此而沾光。

出了人民大会堂，我就问旁边的看守：我们怎么走？他就说：你们愿意现在离开也可以。我说：号子里还有我的东西呢！他说：有什么东西呀？我说：有一桶牙膏，一个洗衣皂，还有点杂物。那我还是回去吧。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回去，我们这儿有车接送。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我们出了大会堂南门后，多数人一哄而散，各自就走了。我呢，依然老老实实地上车，回去把我的东西收拾干净了，那里面还有我写的诗稿啊什么的。我都收拾好了，再出来。

我印象中，他们是用车把我们回监狱的这些人送到靠近各自住所的地方。我就在地安门大街附近下的车，大概是在深夜里到家的。我一进门，把我弟弟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半夜三更回来了？我说：放了啊，然后就兴奋地给他描述晚上的会。

然后，我说：别的不说了，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赶紧拿出来。孔栋找出些花生、饼干之类，我就噉哩咔嚓开始吃起来，才开始缓过点劲儿来。

我赶紧问孔栋：妈妈呢，怎么样了？

他说：你不知道啊？

我说：怎么啦？！

他说：你进去的那天晚上，妈妈就走了。

我说：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她那呼吸变强了一点，面色稍微有点恢复了啊。

孔栋说：人最后什么叫回光返照啊，就是那感觉。我也以为妈妈救过来了，其实也就是身体最后的努力挣扎吧，但一直再也没恢复知觉。就在你被抓的那天晚上走了。

我说：后事怎么处理的？

他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个人，帮着一起处理一下，就拉到八宝山去了……

我说：机关有没有关心家属一下啊？

他说：没有。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国务院机关是把她自杀作为叛党行为来对待了。

2017年4月12日

□ 来源：《新三届》微信群

~~~~~

【千秋功罪】

孔丹“天然”竟何如？

• 栗奇程 •

孔丹在退休后（或其前？）发表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又围绕这篇口述史发表了其他一些文字，谈他经历过的文革，道出文革历史的一些侧面。作为文革前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的高三学生，孔丹比其他中学生更成熟。几十年后回忆，他仍愿把自己和一些同志描述为稳健正统的共产党，在运动时节，特别是其初起之际，有别于他所看不起的、类似“勇敢份子”（注一）的红卫兵。

他在1966年发起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试图在政府机关瘫痪的局面下建立某种革命秩序。用放大镜看那段历史，“西纠”成立的初衷合乎周总理的需要，似乎触忤毛主席直接指使的“中央文革小组”，可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并不是老百姓关心的事。在老百姓的记忆里，“西纠”在当时既持有暴力又持有特权，是无法无天的凶物。

作为有文化知识的共产党员，孔丹一定读过《新民主主义论》，一定熟知其中关于“国体”问题的经典之言：

“这里所谈的是‘国体’问题。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

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

已故张中行先生指出中共治国施政的一大特点是永远需要“使民战栗”。这个特点的端倪初见，就在一九四零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细味以上那个完整段落的文章，任何人都同意，它的意思是说，中共“所要的国家”，必得以对内镇压为其开端。如果说，那是前现代的特色使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延伸，也是历史的不得不然，那么，对照一九四九年至今的中国历史实际演变，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在社会内部——进而“就在共产党内”——找出政治敌对势力（用毛泽东时代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找到挨整的料），是“领导一切”的经常性需要。不断地找敌人，不断地使民战栗，目的是什么？归根结蒂，是要死守《新民主主义论》的窠臼，将“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注二〕永久化，是为了使立法、司法、行政和军队等一干权力公器永远不能从朝廷把持下还之于民、还之于社会，也就是为了使中国永远不走上经由约法（宪章）、对话、求同存异和守则竞选出政权的现代社会的正路。（说句跑题的话，中华文明是否将被孔丹辈所坚信的这条政治邪路导入人类进化全图中的一枝“盲链”而终于消失，目前亦在未可知之数。）

孔丹口述史的结语是，此生已矣，无论做人做鬼，他都属于共产党，变不了了。论个人私德，这可以称为一以贯之。可是，如此一以贯之，还不能与诚实二字划等号。以公德鉴之，孔丹无法避开人生于世应当一贯修辞立其诚的问题。笔者学级低于孔丹，荒唐时世中属孽海一粟，经历不能与他相提并论，但也不妨提供本人亲历的并不显赫的历史侧面和个人感想。

一九六六年的一个冬日夜间，我所在红卫兵组织（不大）中十来个人从西单菜市场（今已不存）门前路过，见上着板的大门外灯下壁上贴出一方红纸，大约三十二开横置，上面是银粉小字。在满墙破大字报纸衬托之下，那张新红纸很是醒目，路人多会凑上去看看。我们过去一看，马上读出其内容是反林彪。该小字报通篇不提林的名字，但题头两三条毛语录中有“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写法及文意极其明显，就是要让一般水平的人都能看懂：林彪正在破坏党的事业，必须揪出来打倒。我们看后心中激动，意识到自己发现了反动言论。当时商议行动，马上用我们组织“抢占”的某长办公室的红电话打到总理办公室报案。（钥匙由办公室主人的秘书交给我们，因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人员闯进机关大楼随意占用房间，故我们的行为有类于孔丹的“西纠”，本是对办公室的保护。）遵照电话那端经请示后传达的指示，我们又返回西单菜市场保护现场，等待上面来人（骑车穿警服的一人先到，开吉普穿军装的数人后至），然后被命令离开，称你们任务已经完成。这个案子当时似未引起太大注意。记得那之后数日间使得北京满城轰动的是对“伊林、涤西大字报”（罪名也是反对林副主席和反文化大革命）的声讨，影响盖过了我们那个“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的得意之举。直到近年来从网上流传的文革史料得到印证，我才得以确定我们那天发现和举报的是舒赛（王藕）烈士所为。（王藕事迹请见“对舒赛（王藕）的讯问记录”一文，载本刊 z k 0 8 0 1 d 一编注）

我们做的那件事情与批斗抄家不同。照孔丹的说法，也算有别于“勇敢份子”的行径。遵从“革命秩序”，根本不问言论者是谁，我们可以算对事不对人。又据知舒赛出门时就没打算能回家，是自愿赴难，因此可说她的被捕不取决于谁人举报。但是，我要告诉后人，这件事情是我的青春之耻和青春之悔之一。首先，握有军警宪特外加民兵等等一切武力强力的中共何用青年学生去保卫？我们那三个“保卫”不啻上面洒狗血、下面耍矫情的一脉装逼。其次，我们今天如此钟爱自己自由发言的权利，为何当年在漫天震响的“大民主”声浪里却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政治观点和言论权利？再扩展一步，自我们成年以后，面对长期汹汹

的社会不公平不正义不发展，我们这一辈人为中国社会做过什么可堪引为自豪值得后人称道的贡献？

读过孔丹，也读过周恩来，我的直觉是，从清末民初过来、有过“国民”概念（参见以上《新民主主义论》引文）的周和成长于毛泽东时代、脑中只有“人民”概念的孔这两代人的内心世界应当毕竟不同。上承周恩来，孔丹之辈自认对得起共产党，这是一件事。而共产党，包括周恩来和孔丹两辈人，是否对得起中国和中国人？这是另一件事。孔丹回顾历史，似只思及前一件事。周恩来易箴之际，料应想到后一件事。

作为孔丹的同辈人，我们也都应当把自己知道的历史和对此生的思索讲出来。孔丹蔑视红卫兵是有道理的。但他也应该认识到自己在文革中所为和至今仍附抱共产党，也同样是屎克郎跟着屁哄哄，难称有几许正派。就算你是大号屎克郎，你号儿再大也大不过周恩来，而周总理当时也无非力主放弃独立思考、跟着毛主席的屁哄哄者之一。今日孔丹俨然觉得自己也算熬成一个有份恣意放“屁”者，故而需要卖力地忽悠人来跟着轰轰，如此“本色任天然”，无非利益既得邪念横流，哪里说得上是“难得”的为人？

注一：所谓“勇敢份子”，原指中共土改中出现的一种现象。依照中共文献记述，属于运动中的不良现象，即大凡有“勇敢份子”追随土改工作队出头痛事的地方，本份贫农反而退避三舍，发动不起来，故大不利于群众提高觉悟并团结在党的周围云云。

注二：“无产阶级专政”虽然甩掉了“人民民主专政”中讨厌的民主二字，但现在也已不便再用。盖因权势集团中人已不再“无产”，而是拥产大大多于寻常，多得不敢公示。新选中的替代语是一句拟于不伦的戏词，叫“红色江山”。

（本文曾署名立其诚发于今已不存的“共识网”，此稿文字略有改动）

□ 来源：《华夏快递》2018年4月18日

~~~~~

【往事非烟】

在秦城监狱的日子

• 阎明复 •

◇ 值班的军人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

秦城监狱有中国“第一监狱”的称号，专门关押重要犯人，曾关押过国民党战犯，各类大案、要案的案犯。“文革”中关押着不少当时所谓的重要“政治犯”，包括由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由第二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军队系统的相关人员，由第三专案办公室审查的中央委员、省部级领导。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员后来也被关在秦城监狱。

我的七年半噩梦般的人生从此开始了。1967年11月1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被“公审”、“逮捕”的我，坐在两名军人的中间，一路漆黑，弄不清楚黑色轿车开向哪里去……走了很久，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夜灯的照明下，看到马路北侧有一大排平房，当中有一个紧闭的大门，外表看上去同农村地区的政府大院没什么两样。我们的车在大门前停了下来，一个军人下车向哨兵说了些什么。过了片刻，大门大开，车驶进大院，在一座平房前停下，押送我的军人把我带进室内，交给了那里的军人，他们就走了。

值班的军人叫我把衣服脱光，换上他们发的白色粗布的衬衣衬裤、黑色的棉袄棉裤。裤子没有裤带，只在上端缝了两根短短的窄布条，用以系扎裤子，棉裤根本扎不紧，走路时要用手提着。值班的军人叫我把鞋袜都脱下来，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可能是想找到微型收发报机吧。我的脚大，穿四十五号鞋，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鞋，就让我穿上自己的棉布鞋。其他所有的衣物都没收了，只有这双鞋伴随我度过了漫长的铁窗下的严冬。

接着，一名军人带着我走过庭院，来到一座设有电网的高墙院子，高大的铁门紧闭着，旁边的哨兵接过通行证，打开了小门，放我们进去。高墙院子里有几座院落，每个院子都有大墙围着，从一个小门进去，就是关押犯人的楼房了。

在楼里，押送我的军人把我交给了管理员。管理员领着我走过很长的过道，其一侧是灰墙，一侧是一间一间的牢房。走到一间牢房的门口，他用钥匙打开了门上的锁，打开外面的铁门，接着又打开里面的木门，让我进去，对我说，你的代号是“6 7 1 2 4”，在这里不允许叫外面的名字，只叫代号。除了不准说自己的名字外，他还接着宣布了他其他几条纪律：一、不许大声说话、唱歌；二、不许在墙上乱画；三、按哨声起床和就寝，有事报告；四、不准和任何人交谈。他发给我两个搪瓷饭碗、一个搪瓷缸、一把勺子、洗脸手巾、牙刷、牙粉和手纸。他说，每次开饭的时候发开水。说完他就走了，先关上木门，后关上铁门，最后听见了上锁的声音。

#### ◇ 成年累月单侧睡眠导致脸的一侧都变形了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来不及思考。直到管理员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消失后，在万籁俱寂的独牢里，我最终意识到我被捕了，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监狱，也不知道要关多久，等待我的是什么，立刻陷入了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

我开始向四周观看，这是一间不算太小的囚室，长方形，横向有十步，竖向有五步。门对面的墙上有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长条铁窗，距地面有一人多高。铁窗下面摆着一张矮矮的木床，上面叠着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和棉褥。门的左侧墙角有带小门的厕所，装有冲水的坐式便桶，墙上有“窥孔”，犯人上厕所时哨兵从走廊可以观察。厕所旁边的墙上装有自来水的洗脸池。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装有两层防护罩的电灯。每天傍晚时灯就亮了，可能是一百瓦，就寝哨吹响后，灯光就调弱，可能是四十瓦，保证哨兵夜间能看清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若有什么怀疑，可随时将大灯打开。

我正在观察，突然听到门上传来声音催我睡觉。我抬头一看，原来门的上方有一正方形的小门，此时小门打开了，只能看见哨兵的脸。原来入寝时间早过，我赶快脱下棉衣，钻进被窝。这时才发现，好像室内没暖气，被褥又太薄，又没枕头，当晚冻得我彻夜未眠。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慢慢习惯了，把棉衣和棉裤压在棉被上，整夜一动不动，以免棉衣裤掉下来。至于没枕头，就把大棉鞋垫在薄褥子下面，一鞋多用，倒也方便。有时睡着了，不慎翻身脸向墙，那可不得了了，只听见哨兵用大皮靴使劲踢铁门，直到把人吵醒，再翻过身来，或身体正卧或朝向铁门。哨兵一定要随时看到犯人的面孔，以免发生意外。成年累月地单侧睡眠，不少犯人的脸的一侧都变形了，成了“秦城人”的一个特征，这都是后话了。

#### ◇ 在囚室里殴打、虐待犯人都出于管理员之手

次日清晨，我听见哨声立即起床。我始终没搞清楚几点钟起床，可能是六时或六时半，也可能是七时。过了一会儿，走廊里传来小车的轮声。小车很快到我门前停了下来，突然看见木门下端的小门打开了，管理员说，开饭了，把饭碗、水杯拿出来。于是，我连忙把两个碗和水杯放在小门外面，管理员用大勺舀了一勺稀饭放在一只碗里，另一只碗里则放了一个窝窝头和一点咸菜，又用大勺舀了开水倒在水杯里，说一天就三杯开水，省着点儿喝。我把饭碗和水杯拿进来后，小门就关上了。这样，我才知道小门的用途。昨夜彻夜未眠，早饭后困劲上来了，就和衣躺在床上，没等合眼，木门上端的小门打开了，哨兵厉声地说，白天不准睡觉！我立刻爬了起来，坐在床上。

我们的牢房是一幢“U”字形的三层建筑物，东、西、北侧各有五间囚室，由走廊相连，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在牢房中，犯人是在看守、管理员的眼皮底下被“牢规”管制的。

天天同犯人打交道的是管理员、看守。我不知道他们应怎样称呼。

所谓的看守，也就是士兵或哨兵。我们的牢门外是一道长长的走廊，一个士兵看三到五名囚犯。他们在走廊里巡视，从每间囚室门上的窥孔监视犯人，发现有违规时，如白天卧床、大声说话，等等，当即纠正，或报告管理员处理。每天起床哨一响，就得迅速地爬起来，谁起来得慢或起不来，他们就来干涉。白天不能躺在床上休息，只要一躺下，士兵就会命令你站起来。睡觉时如果不面向门，他们也会立刻踢门。他们不能随意开门进入囚室。这些士兵很少有熟面孔，常常换新的。

管理员是不常换的，通常少言寡语。管理员做的事情，据我看到的，则是处理犯人的日常生活事务，如放风、洗澡、发饭、发报、押送犯人去审讯室、去门诊室、去探访室（如有亲属来探监），等等。犯人有事都要向他们讲。同他们讲话要先说“报告”。管理员有权打开囚室的门，进入囚室，对犯人进行管制。在囚室里殴打、虐待犯人都出于他们之手。

#### ◇ 秦城监狱的第一次提审

辛酸和耻辱，以及饥寒交迫、饥饿难挨的日子，而这些不过是这场牢狱之灾的一角而已。

七年多来，我不记得监禁期间的审讯一共有多少次，头一两年多一些，后来几乎没有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审讯。

入狱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8日上午，不知道几点钟，囚室门开了，管理员走进来说：“提审，跟我走。”

从囚室出来，沿着走廊向左走，过了一个铁门向右转，又是一个长长的走廊，一边是墙，一边是一间一间的房间。在其中的一间的门口，管理员叫我停下来，他打开门，对屋里的人说了些什么，然后叫我进去。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门的左边有一长条桌，上面铺着白色桌布，后面坐着几个军人。在室内另一侧，正对着桌子大约二三米，放了一个椭圆形的墩子，看上去是瓷的，后来听说，是实心的，灌了铅，怕犯人拿来砸审讯的人。

专案组读罢语录，又讲了一大篇话，大概都是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套话，我早已忘记。只记得他们叫我交代同彭真以及同杨尚昆的关系。

这对我来讲简直是轻而易举、驾轻就熟的事啦。中办“文革”开始，还在中南海的时候就讲起，一直讲到“学习班”，材料写了一篇又一篇。于是我就滔滔不绝地“交代”。讲到中午了，专案组宣布暂停。管理员带我回囚室吃饭，吃完饭，又把我带回审讯室。我又接着“交代”，直到天色已黑。

冬天日短夜长，大概快五点了，我也饿了。于是我说：我交代完了。专案组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怎么，完啦？我说：是呀，完啦！专案组说，怎么完了呢？你最主要的还没有交代呢！我倒是真惊讶地问道，有什么最主要的还没交代呢？专案组神气十足地说：“你‘里通苏修’还没交代！”我听了哈哈地笑了两声说：“我‘里通苏修’？毛主席还表扬我是反修英雄呢！”

其实，毛主席从来也没说过我是反修英雄。毛主席说过：“小阎不怕外国人！”说的是毛主席同赫鲁晓夫“吵架”时，我当翻译不怯场，理直气壮。专案组竟一口咬定说我“里通苏修”。我气极了，就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毛主席表扬我是反修英雄。”专案组当然不知道毛主席是否讲过这类话，更不敢否定，毛主席讲过的话谁敢否定！于是，他们说：毛主席表扬过的人多着呢。我说：那好，你们就查吧，纯粹是……本来想说白白浪费时间，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应该说，我的这个专案组从一开始就没大声地训斥过人，没有搞过“逼、供、讯”。从这个时刻起，那种忐忑不安的思绪一扫而光，完全消失了。我从来没有“里通苏修”，多年来，我努力地跟着毛主席在反苏修斗争中当好翻译，水平高低任人评说，但我不是特务！毛主席的教导“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成了我的“定心丸”。

这样，第一场审讯就结束了。回到囚室后，心情平静下来，反而开始感到“饥寒交迫”了。

◇ “不交代拉出去枪毙！”

我的特嫌问题似乎“无文章”可做了，但针对被打倒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莫须有的“揭发”接踵而来。各式各样的专案组都到秦城来提审，企图从我这里找到“突破口”，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审讯并没有停止。

审查陆定一的专案组的组长（不知道他是不是组长，姑且称之）蛮不讲理，胡搅蛮缠，毫不懂政策，看样子不过是个芝麻大的军官，却装出一副大官的模样，真是令人恶心！

本来，审讯室的桌子上已给专案组摆上了茶杯，但这位组长来后，看也不看，从自己的皮包里掏出一个又长又大的玻璃瓶，用手绢擦了又擦，然后用眼睛仔细看了又看，再掏出一个信封，倒出几片茶叶，用水冲开，再品尝几口，才抬起头来，看我几眼，然后发问，你是阎明复吗？我说，是。他问，你是中办翻译组组长吗？我说，是。他问，你认识陆定一吗？我说，认识。他问，你给陆定一当过翻译吗？我说，没有。他说，陆定一当时是中央领导人，你怎么可能不给他当翻译。我说，没当就是没当，我们只为常委服务。他问，你给尤金当过翻译吗？我说，当过呀。他说，那陆定一同尤金谈话你一定当过翻译啦。我说，没有，毛主席接见尤金我当翻译。他说，不准你提伟大领袖！我说，你问我给尤金当过翻译没有，

我才提到毛主席。他喊了起来：你没有资格提到伟大领袖，你再抵赖，拉出去枪毙！我说，枪毙我也没给陆定一当过翻译。他这样胡搅蛮缠地喊了半天，只能无奈地收摊了。

过了几天，我的专案组来了。我对他们讲了陆定一专案组提审的情况。他们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绝不能讲假话。要相信党的政策。

后来，陆定一专案组又来提审，还是老一套，“不交代就拉出去枪毙！”“坐一辈子牢！”等等。我只是一句话：我从来没给陆定一当过翻译，我不能讲假话。气得他们只好悻悻而去。

应该说，审讯的过程是考验人的良心、勇气、信念的过程。在审讯中顺着提审人的“诱供”，“讲假话”、“乱咬人”可能是恢复自由的一个机会。对于一个被关押在暗无天日的独牢里的“犯人”，没有比“马上恢复自由”的许诺更具有诱惑力了，但是要付出“讲假话”的代价以及由此而产生严重的后果，殃及的将不仅是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可能使更多人遭到诬陷！面对“检举揭发，立即释放”的诱惑，面对“不交代拉出去枪毙”的威胁，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讲假话”的念头。坚持不讲半句假话，在艰辛漫长的囚禁生涯中，倒使我心境豁然。

“四人帮”被打倒后，对专案办公室的人员进行了审查。组织上找我了解我接触过的专案组的表现。我说，审查我的专案组讲政策，实事求是。而最不讲政策的、胡搅蛮缠的就是审查陆定一的专案组。

若干年后，陆定一陆老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时，我去看望他老人家，谈到“文革”时期的专案组时，陆老气愤地说，这些家伙坏透了！

#### ◇ 熟悉的咳嗽声

1968年四五月间，我偶尔听到十分熟悉的咳嗽声，真像我父亲的声音。但是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谁能想到，这位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人竟然也被关进秦城监狱，竟然也成了我的难友！父子同狱，中间只相隔二十三个人：父亲的代号是67100，而我的代号是67124。

“文革”后才知道，就在我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后过了没几天，备受折磨的他老人家就含冤离开了我们。

与世隔绝的监狱，也是特殊人群聚集的特殊空间。在独牢中我看不见他们，只能从时隐时现、断断续续飘来的各种声音中来辨别“谁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为难友的命运惋叹。那冥冥中传来的老父亲痛感至心的切肤之声，多少年过去了，还在心里、还在耳边，还在那些艰辛苦涩的日子里……

#### ◇ 吃饭——菜里夹着蚂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

再谈谈监狱的伙食。入狱后的大半年，的确尝到了“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以用量少质差概括我的伙食。一碗稀饭、一个小窝头，就是一顿早饭，中饭或晚饭，有时是两个小窝头或一碗糙米饭和半碗菜。我们吃的菜可能是劳改农场供应的。看来，农场收什么菜，我们就吃什么菜。每年春天差不多都是菠菜下来了就吃菠菜，一吃就连续吃上个二十多天，然后就

是小白菜、萝卜，等等。这些蔬菜看来根本不淘洗就放到大锅煮一下，盛到碗里上面是菜叶，下面是泥汤，菜里夹着蚂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

有一次吃菜，一下子咬了一个肉鼓囊囊的东西，还有点香味，我还以为是一块肉呢，连忙咽了下去，剩下一半用筷子夹起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青色的大菜虫，也不敢扔，只好放在碗里，等洗碗的时候才扔到便池里。前些时候，我的邻居吃饭的时候不知把什么扔到便池中，没等冲洗，就被哨兵看见，立刻从走廊里把自来水闸门关上，硬是强迫这位难友从便池里把扔掉的东西捞上来，一口一口地吃掉，还大骂他这个反革命不想活了，竟敢糟蹋人民的粮食。

最难熬的是星期天和节假日，一天只给两顿饭，而且早上一大早就送来早饭，大都是两个窝头，下午两三点钟就开中饭，也是两个窝头。这样要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饭吃，这十五六个小时真是饿得心里发慌。而遇到五一、十一节日连续放两天假时，更是难上加难。

1968年夏天以后，伙食有明显改善。我获释后了解到，当时有几位老同志在狱中死去，周总理闻讯后特地到秦城视察，指示要认真改善审查对象的生活。于是，每个星期菜里也出现一两小块肉，或菜汤里有一点点儿的油花。这已是了不起的改善。而每次过春节，伙食大改善，不是吃大肉包子就是吃炸大油饼，我们要几个，管理员给几个，而且还来回地打开每个囚室的小门问，还要不要，还要不要……记得一次，我吃过十多个包子、八九个大油饼，吃完以后，胃涨得难受。真是饿也难受，饱也难受呀。

#### ◇ 理发——没有指甲刀只好用牙齿来咬断

“文革”初始，公安系统受到极大冲击，军队进行接管。秦城监狱也不例外，原有的公安管理人员所剩无几，我接触到的都是军人。原来的管理制度也被破坏了。比如说，我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放风，整天憋在囚室里。幸亏是冬天，牢房又大，没感到空气污浊。头几个月一直没理发，头发长得长长的，这倒也能忍受。最难受的是头几个月无法剪手指甲和脚趾甲，指甲不仅长得老长老长的，而且向肉里长，我只好用牙齿来咬断手指甲。当然，更谈不上洗澡了。

直到第二年春天，对犯人的生活管理才走上正轨。每个月管理员给犯人剪一次头，当然剃成光头，而且是快速的，咔嚓咔嚓几下就完工，推子钝有时免不了连推带拔，但总算是剪头啦，总不至于成了披头散发的“嬉皮士”了。剪头的时候，管理员叫犯人到走廊里，坐在凳子上，披一块布，就动手推起来了。而剪指甲时，当然也是每月一次，管理员打开囚室的门，走进来，说剪指甲啦，然后递给犯人一把剪指甲刀，让犯人自己剪，他站在一旁严肃地监视，一言不发，直到剪完，把剪指甲刀收回，退出囚室。

#### ◇ 洗澡——提前解开衣扣搓掉身上的泥垢

大概是1967年年底或1968年春节前后，开始安排犯人洗澡。因为是隔离性的监狱，每个犯人住独牢，不能让彼此有任何接触，所以不论是洗澡、放风或提审，都要严守犯人彼此不见面的监规。浴室就在这座楼内的北边，有五间淋浴间排成一排，每间有门，对面的墙只砌了一半，大概到洗澡的人的腰部。每次洗澡，在囚室外面的走廊里有一个管理员，在第一个拐角处有第二个管理员，在第二个拐角又有第三个管理员，以此类推，只要有拐角就有人看守，直到浴室。洗澡时，第一个犯人在走廊里走过拐角，才让第二名犯人走出囚室，沿走廊走到拐角，等第一个犯人走过第二个拐角，才让第二个犯人转弯走到第二个走廊，此时才让第三个犯人走出囚室，走到走廊的拐角处，以此类推。

在浴室，第一个犯人走进最里面的淋浴间，管理员从外面把门关上，才让第二个犯人走进浴室，进到倒数第二个淋浴间，如此类推……直到第五个犯人走进第一间淋浴间。从第一名犯人走进淋浴室起，就有一个管理员在只砌了一半的墙外走来走去地监视。洗完了押送回囚室的顺序也是如此，只不过是倒过来，第五个犯人先走，以此类推。总之，犯人彼此连背影都看不见。洗浴的时间大概不到十分钟，动作慢了，管理员就会大声催促，快一点儿，快一点儿……这也难怪，一个楼里大约四五十个犯人，一批五人，要分九批，而押送的时间可能比洗澡的时间更长。习惯了以后，每次听到要洗澡了，我事先在囚室里就解开衣扣，用手搓掉身上的污垢，到澡堂用热水冲几下就万事大吉了。

#### ◇ 放风——防范犯人在地上留暗号，有专门扫地的哨兵

放风也差不多是在1968年的春天开始的。

监狱的楼形像一个“U”字，中间就是放风场。放风场是由长方形的格子间组成，东西两侧各十间。每个格子间都是露天的，有个小门，进去三面是墙，放风就是在格子间里“坐井观天”。放风场上面有一“天桥”，哨兵在上面来回巡视，监视每个格子间里犯人的动静。犯人从囚室到放风场的押送办法，同前面提到的洗澡的办法相同，只不过多一些拐角、多一些哨兵罢了。

放风的时间大概是四十分钟。一开始是隔三岔五，1973年以后，放风的时间多了，一周至少有一两次。每次放风，都走进不同的格子间，每次都发现地上总是有扫帚扫过的痕迹，后来才猜到，这是防范犯人们在地下留下什么暗号，在前一批犯人走出后，哨兵们赶快扫一遍。

#### ◇ 读报——有一天林彪的名字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

1967年年底，我的“苏修特嫌”问题查清后就允许我看《人民日报》了。每天上午，管理员把当天的报纸发给我，第二天发报时收走前一天的。当时，每三个犯人看一份报纸，第一天管理员发给我当天的报，第二天发报的同时要收回前一天的报纸，再发给邻室的犯人，第三天再把这份报发给第三位犯人。

并不是所有的犯人都能得到报纸。我记得，有一次管理员给我右边囚室的犯人发了报，接着他又对这位难友说，发错了，发错了，你现在没有资格看报，快退给我！这位难友可能与外界隔离已久，好不容易得到一张报纸，哪里肯退给管理员。管理员只好打开囚室的门，走进去把报纸抢了回来。这样我才明白，入狱后一个多月没让我看报，是专案组第二次来提审后才让我看报，显然是我的问题基本查清了。

在漫长的监禁中，《人民日报》成了我的无声同伴，是我了解大墙外面的世界的唯一途径。我每天都焦急地等待管理员来发报纸，一旦拿到报纸就如饥似渴地从头版头条开始阅读，逐行逐字地一直读到四版的最后一条消息，读完一遍后又重头再读一遍。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读过报纸。我与报纸上的信息同乐同悲。

我记得，1971年9月中旬以来，林彪的名字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他的语录也不登了，照片也不上报了，我马上意识到林彪出事了。但是，我无法猜出问题有多严重，直到林彪专案组审讯时，才听说他叛逃未遂，机毁人亡。党章封的接班人居然叛逃，我百思不得其

解。林彪是“文革”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煽动造神狂热，迫害大批昔日的战友，同时，我还为自己的敏感、判断力并未因多年的独牢丧失而颇感欣慰。

□ 摘自：《阎明复回忆录》

~~~~~

【劫后余波】

看文革如何影响80、90后心理成长

• 张鸣真 •

对今天的80后、90后来说，文革是一段模糊的历史，因为我们不可能亲身体会到这场灾难，也不知道这段黑暗的历史会给心灵带来怎样的改变。今天的年轻人，带动的是“互联网”的发展，掀起的是“全民创业”的潮流。阅读到的，更多的是关于文革的官史，官史一般缺乏对历史细节的描写，书本上记下的，只是一些抽象的结论。

也许我们不曾意识到，文化大革命这场民族浩劫，直到今天还在对已是壮年的80后和尚且稚嫩的90后隔空喊话，它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决定了我们的原生家庭状态。

◇ 缺乏忏悔的父辈 VS 少有敬畏感的年轻人

很多年前，作家巴金就不遗余力地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但他的提议终究被拒绝了。现在看来，缺乏忏悔，正是中国对文革反思的一个缺陷。

中华民族历来缺乏忏悔的基因和赎罪的传统。学者李泽厚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它根源于人性本善的理论，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与之相反，西方文化被称为“罪感文化”，这种文化是宗教性的，它启发人的良知，并鼓励人通过忏悔来减轻内心的罪恶感。

而我们邻国，日本和韩国则奉行一种“耻感文化”，他们用羞耻代替赎罪，又用耻感鼓舞自己发展的步伐。所以，面对纳粹德国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向波兰人民下跪，日本则做不到这点。而在以“乐感文化”为传统的中国，我们更愿意选择忘却。如果在反省灾难、又必须提及伤痛的那一刻，我们宁愿选择控诉，中国有很多控诉者，他们控诉十年浩劫中的心灵创伤，并用控诉代替忏悔。

有研究显示，婴儿在3个月内就会具有内疚能力。因为婴儿看到了妈妈的真实存在，他会与妈妈建立起一个“我存在，你也存在”的真爱关系。如此一来，一旦婴儿攻击了妈妈，他会感到内疚，因为他知道妈妈会感到疼痛，所以这种“共生关系”，让婴儿感觉，攻击了妈妈就是攻击了自己。由此，人类攻击别人的倾向就会得到限制，但这份限制不是因为害怕被惩罚，而是因为感同身受。

可是，不会忏悔的、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父辈，终究没有把在内心法庭中审判自我的能力传递下来。年轻的一辈，仍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愿赌服输。

于是，今天的80后和90后，普遍缺乏对权威的敬畏感，很多人在婴儿时期没有学会与母亲“共生”，在长大之后也自然不会与团队“共生”。自私、冷漠、利己主义的心理根源，并非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来自于50年前那场改变了人性的文化大革命。

◇ 灾民心理 VS 现世享受

文化大革命，还带给了50、60后一代人强烈的“灾民意识”。在那个艰难的年代，人们在内心会把灾难当做常态，把温饱当做富足。灾难中成长出的一辈，会把生存当做人生最高理想。于是有人把“灾民意识”概括为三个特点：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和力量崇拜。

其实，在中国历史中，人口膨胀、资源紧缺、环境恶劣是常态，所谓的“灾民心理”的形成，不能完全归咎于文化大革命，千百年来的中国一直是这个样子。

“灾民”的心底究竟在想什么？不过是争先抢后成为“人上人”。

于是，中国人集体生活的智慧就特别突出，在海外，经常有“华人一进城，满城皆失业”的说法。在国内，职场厚黑学异常流行。我们习惯了为了生存舍弃一切的生活状态，时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职场中的嫉贤妒能、尔虞我诈，被当做高情商的解读。实际上，这不过是当年“灾民心理”的集中体现而已。

在80后、90后当年的教科书里，经常出现“蜜罐中的一代”的字眼。是的，比起父辈和祖辈，我们今天的生存环境的确是好多了，再也不用为了生存而挣扎了。可是，具有显著“灾民心理”遗传特征的父辈，在经历过一次长达十年的文革洗礼之后，教育出的子辈，会更重视现世的享受。因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没有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年轻一辈，会耳濡目染传承下父辈的恐惧，一方面害怕灾难，一方面又要拼命享受，从而不断地告诫自己：灾难离我很远很远。

有人把80后、90后的心理特点归结成几个字：淘、秀、晒。

在欧美国家，即使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二代”，也会被父母告诫，要低调行事，平等待人。与之相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比中国人更爱晒自拍了，我们喜欢在朋友圈里展示远远高出自己真实水平的、被粉饰了的生活。所谓的炫富，不过是心理价值的缺失。其实，秀自己、晒美拍，也是因为我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了太多的“灾民心理”，我们必须要用现世的享受，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如果能把自己现有的生活在完美包装后展现于朋友面前，那最少这样能让年轻人潜意识中的恐惧，减少那么一点点。

◇ 不门当户对的婚姻，生出内心纠结的孩子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门当户对一直是婚姻的传统习俗。先不说这种理念是否正确，但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动荡的政治局势，大幅度地削弱了“门当户对”的婚姻的比例。

当年，多少适龄年轻人因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从而铸就了无数对失衡的婚姻：女知青嫁给了大老粗，家庭成分不好的知识男青年，娶走了又红又专的女工人。

不断有婚姻专家指出，真正幸福的婚姻在于两者的相似性。上学时我有一个特别斤斤计较的同学，就算是外面吃快餐，她也会和服务生计较一下，自己碗里的鸡蛋是不是比别人少了。后来她交了几个男朋友，有的是高级金领，有的是艺术家，每个人都会嫌和她过日子太

累，说她是“拿着计算器活着”的小妇人。可是前一阵，她幸福地嫁人了。有一次我听说，他们小两口和另一个朋友打车回家，眼看车上的计价表就突破了50元，她突然冲着司机大喝一声：“停！就到这里！”我的朋友还没有回过神来怎么回事，她就和老公就迅速刺溜下出租车，这时候，离他们住的小区还有500多米。

“你知道这两口子有多般配吗？下车之后，她老公还跑到出租车司机那里去争辩，因为司机好像绕了个路，所以他想少付5块钱。”我的朋友眉飞色舞地对我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两口子一点都不缺钱，他们每个月的总收入都达到6位数了。而他俩的小日子过得又特别甜蜜，天天在朋友圈晒豪宅里的半裸自拍。

其实，真正幸福的婚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的相似性基础上的。可是，文化大革命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能把背景、身份和世界观完全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个需要不断磨合与碰撞的家庭关系。

西方心理学家认为，如果夫妻双方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那么即使不离婚，他们“制造”出的孩子也会异常纠结。这种背景下成长的孩子，会形成一定的意识混乱。如果父母同时告诉孩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那么他就会认为这是对的。可如果一方家长鼓励你好好读书，又有一方告诉你“读书没用，社会才是最好的大学”，那么孩子就会产生价值观上的迷惑，从而导致行为上的纠结。

80后、90后已经迈入了为人父、为人母的时代，原生家庭对现今生活的影响也一再被社会放大，而今天中国的离婚率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父母失衡的婚姻，造成今天的年轻人对自己家庭生活的不自信，而从小价值观的混乱，也让中国年轻人的婚姻充满着各种的可能和纠结，才让本就棘手的婆媳关系，变得雪上加霜、段子迭出。

高晓松说：历史不是故事，历史是事故。历史越向前，我们对文革的认知也就越重要。如果一个民族不能放下尊严、直面反省，那么50年前的文革，不光会对今天的80后、90后产生不可预估的心理影响，在50年、100年后，就连我们的子孙后辈，也会被其株连，永远走不出历史留下的心理阴影。

□ 来源：腾讯新闻腾讯专稿

~~~~~

【亲历者言】

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选载之三）

• 陈楚三 •

（上接 z k 1 8 0 4 b ）

第四节 冤假错案何时了？

文革后，特别是在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但也有的留了“尾巴”，例如坚持不给几名右派分子“改正”。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没有真正恢复。前任领导搞的冤假错案可以平反，现任领导搞的有些就不能平反，这似乎也是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为他之前领导人制造的许多冤假错案平了反，而毛泽东担任领

袖期间的许多冤假错案则是在他身后才平反。毛泽东没有为“富田事变”平反，邓小平也拒不给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五名“右派分子”“改正”（注5·4·1），拒不为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挨整的刘伯承、粟裕平反（注5·4·2）；原因就在于，他们正是这些事件的相关责任人。

由于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使平反了过去的冤假错案，也还会发生新的冤假错案，文革以后也不例外。

仅我所知，为了平反贺龙的冤案，又制造了两件新的冤案。

一件冤案是，1967年2月14日，武汉市第二十中学英语教员晏章炎写给“中央文革小组”材料，说他父亲晏勋甫在生前告诉他一个埋藏在心里多年的秘密：即贺龙在历史上，1934年曾经企图“叛变投敌”；后来为贺龙平反，1983年6月，晏章炎以“诬陷贺龙”被判处七年徒刑。

另一件冤案是，1968年春，国务院参事李仲公上交周总理两封贺龙于1929年写给他的亲笔信，信中请时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次长的李仲公“代呈”、“代陈”蒋介石，“请求一切”。后来为贺龙平反，李仲公以“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被定为“蓄意陷害贺龙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罪行严重”。

有资料表明，早在1966年9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就对贺龙进行了揭发批判，“主席说要向高级干部打一个招呼”（注5·4·3），此后由肖华、杨成武带领各军兵种负责人到叶帅家中看有关贺龙的揭发材料，叶帅对大家说：“主席对贺龙很不放心……总理刚才打电话来，特别强调要注意看投敌问题”（注5·4·4）。1967年1月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也是由毛泽东决定的，因此，贺龙被打倒已经无可避免；而晏章炎和李仲公的揭发材料均在此之后，对打倒贺龙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晏章炎曾三次揭发贺龙“乞降”问题，第一次是1964年下半年向学校党支部书记汇报的，被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否定，这时的贺龙在政治上正红得发紫，晏章炎如果真想诬陷贺龙，也决不会选择这种时机；而王任重也没有给晏章炎扣上“诬陷贺龙”的大帽子。第二次是1966年7月23日，被时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驳回，当时的贺龙仍然受到信用。

中央文革收到晏章炎1967年2月14日的举报信后，于6月13日派出调查组，调查组找到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3月17日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表明，1933年12月，政客熊贡卿（又名熊瑞龄）欲“游说”贺龙，企图“收编”。熊贡卿先派梁素佛（又名梁天闻）来到湘鄂西联系。贺龙发觉来人之阴谋，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允许熊贡卿来到湘鄂西。在熊供述有关情况后，即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予以处决。显然，只有在贺龙的表态骗得熊贡卿信任的情况下，熊才会亲自来苏区并提供“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贺龙的表态骗了熊贡卿，也让晏章炎的父亲、时任国民党南昌行营二厅厅长的晏勋甫信以为真。晏勋甫后来起义投向人民阵营，临终前把此一“秘密”告诉自己的儿子，并不奇怪，不能据此认为是“诬陷贺龙”。

再说，晏章炎只是据实反映自己父亲生前所说的话，至于父亲生前所说的内容是否属实，应当由组织上调查确定，并不是晏章炎的责任。既然调查中取得湘鄂西中央分局当年给

中央的报告，事情的真相也就清楚了，但调查报告却掩盖真相而采信晏章炎的“揭发”，给贺龙加上“通敌未遂”的罪名并上报（注5·4·5）。

所以，追究晏章炎的刑事责任并判处他七年徒刑，显然是一起冤案。而掩盖真相、昧着良心仍然认定贺龙“乞降”的人，才应当承担“诬陷贺龙”的罪名。

李仲公的女儿李幼华曾发表文章（见“李仲公上交贺龙信的前前后后”，载本刊zk1001c一编注），讲述文革中其父交出贺龙1929年两封亲笔信的经过。文中指出，这两封信是在中央专案组的逼迫及“抄家”的威胁之下，“翻箱倒柜”在“一堆旧文件书报中”找出来的，但李仲公并没有把它交给中央专案组，而是交给了周总理（注5·4·6），时间是1968年4月初。（注5·4·7）

对李仲公还只是逼迫及“威胁”，这是因为李当时还是国务院参事，专案组不能不有所顾忌；对李仲公的亲属就不“客气”了，“据李仲公次女李幼华介绍：在其父未交出贺龙信件之前，专案组直赴苏州四井巷李仲公、吴澄华（李妻）原居住地进行挖地三尺式的‘抄家’，并将居住在老屋子里的吴澄华之妹吴澄娴以‘反对江青’为名抓捕入狱，迫害至死。‘抄家’、‘捕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贺龙的信件。”（注5·4·8）

指控李仲公“伪造信件”“陷害贺龙”的详情，以罗美元的文章（注5·4·9）最为详细，但文中所述有诸多疑点，如说李仲公在1927年3月被贺龙拘捕前“不认识贺龙”就与事实不符，李、贺此前已经认识并见过面。最关键的疑点是贺龙专案组得到两封信的时间。罗文说：“1969年7月，贺龙专案组第三次派人来找李仲公。来人专门做李仲公的工作说：九大已经召开了，原为政治局委员的贺龙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你还有什么顾虑呢？李仲公表示，自己没有顾虑了。他立即拿出自己伪造的两封信，交给来人”，而随后“李仲公还为此写了说明”，可所写说明的日期却是1969年12月26日，前后相差五个月。但无论如何，第一，李仲公早在1968年4月初已将两封信的原件交周总理，这次在1969年7月以后交出的肯定不是原件，只能是抄件；由此是否可以推断，周总理始终没有把李仲公上交的两封信原件拿出来？如果周总理已把原件交专案组，专案组就不会对李仲公苦苦逼迫了。第二，贺龙已于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据罗文，从1968年6月到贺龙去世的一年时间里，专案组没有再找李仲公，专案组“将工作重点放在要李仲公交出那两封信”的决定似乎并未贯彻，同时，专案组在这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理应对两封信问题要贺龙说清楚，贺龙是如何应对的？罗文一字未提。专案组在贺龙去世后才追索两封信，以及为贺龙平反的文件中只提到1933年熊贡卿“游说”事而未提1929年的两封信，表明并非如罗文所说“这两封信是贺龙最主要的罪证”。既然专案组得到的两封信不是原件，后来为贺龙平反时周总理要求对两封信拿到公安部门鉴定，结果为“伪造”也就毫不奇怪了。

罗文还特别提到，在为贺龙平反过程中，周恩来曾批示：“约李仲公一谈，告以在1968年交出贺的1929年5月两封信，非贺龙亲笔，且贺字云青，并非云卿，代笔定非新近之人，可以断为伪造之信……望李老实交待，可得宽恕，否则将进行彻查，以弄明真相。”此“批示”疑点至少有两个：一是世人皆知贺龙字云卿，更不用说心细如发又深知贺龙的周总理了，却为何“批示”说贺“字云青”？二是“批示”说两封信是“1968年交出”，但前文却说是1969年“九大”之后交出。由这两个疑点，笔者揣测，或者该“批示”是有人杜撰，根本不存在；如果确实存在周总理的这个“批示”，那只能说周总理是故意露出“破绽”让后人质疑李仲公冤案。不过，这两个“破绽”并不难发现，为何竟无人质疑，罗文也只是原文照抄，这倒是值得深思的。

怪不得李幼华要发问：“‘原件’还在吗？也许将是一桩历史‘悬案’了。”我则深为佩服周总理殚精竭虑保护贺龙的一片苦心。但是，李仲公却因此背上“伪造信件陷害贺龙”的罪名，沉冤难雪。周总理其实也想给李仲公“台阶”：周总理的批示说，李仲公所交两封信“非贺龙亲笔”，“代笔定非新近之人，可以断为伪造之信”，其实是在暗示两封信是当年他人（“非新近之人”）“代笔”“伪造”；李幼华也提到，童小鹏（注5·4·10）曾提示李仲公说那两封信可能是“有人假借贺龙的名义写的”。但如李幼华所说，“可恨李仲公又臭又硬”，给台阶不下，一口咬定是贺龙亲笔（而绝非罗文所言承认“是自己伪造了信件”），才被横加“蓄意陷害贺龙”的罪名。

我认为，李幼华的叙述是可信的；两封信的原件确已送总理，李仲公并没有伪造。这恐怕是给贺龙平反的中央文件不提这两封信的唯一原因。但正如1933年贺龙曾骗得熊贡卿信任以便“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一样，这两封信何尝不是贺龙试图骗取蒋介石信任、如李幼华判断“以减轻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压力，谋求革命队伍发展空间”的斗争策略呢？不过，贺龙骗熊成功并将熊杀掉，有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作证，对贺龙的骗局信以为真的晏勋甫，他的儿子成了“诬陷”者；而这次贺龙的两封信骗蒋未遂，收信人李仲公成了“伪造信件”者。何其冤哉！

为了坐实江青的“叛变”罪名，也制造了新的冤案。冤案的主角是徐明清（注5·4·11）。

徐明清1926年参加革命，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工作时，徐明清曾是江青的领导，两人有过一段来往；徐明清于1935年4月被捕，1936年6月被营救出狱；1937年在延安时，徐明清还为江青写过一份证明她在上海参加过革命活动、表现进步的材料。文革中的1972年，徐明清被错定为“叛徒”，开除出党，为此，徐明清曾于1973年给江青写了三封信，希望江青如实为自己的历史作证，推倒强加的“叛徒”罪名，但终未有回音。

文革结束后，中央专案组开始审查江青的历史和罪行时，从江青的档案材料中发现了徐明清的求助信和两人在三十年代曾有过的交往。1976年10月以“帮助江青混入革命队伍，给江青写过信，长期包庇江青”的罪名，将徐明清正式逮捕关到秦城监狱。

专案组要求徐明清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但徐明清认为自己并不知晓江青的历史问题，无法作出揭发。她的态度是，无论对待什么人，都应该实事求是，自己不知道的不能乱说，不能不顾事实去捏造。

徐明清写下的材料，被审讯人员认为是“客观主义”，不老实，总也通不过。每次谈完话，那些人都放下几张纸，让她继续写。几轮下来，他们仍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些人急了，大声训斥徐明清：“你这个人，不吃敬酒吃罚酒。让你写江青怎么叛变的，你写了不就没问题了嘛，不就可以放你回家了嘛！”徐明清说道：“江青被捕和我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并不清楚她被捕后是否叛变，更不知道她叛变的细节，我怎么能写呢？我也写不出来啊！”

于是，审讯人员对徐明清实行“车轮战”，一天提审数次，白天黑夜不让她睡觉。如此的精神和肉体摧残，巨大的政治压力，折磨得徐明清头脑晕痛，握笔颤抖，几乎神经错乱。

1977年1月8日，徐明清被迫写下了一份交代材料。

徐明清万万没料到，不到两个月，她写的那份材料竟被影印收入一份“红头”文件——中发（77）10号文，即《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中，并于1977年3月6日印发全国。文件说江青和徐明清不但“先后被捕，自首叛变”，而且“订立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江青“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徐明清被关入秦城监狱两年多。

1980年3月10日，农业部党组经中央组织部审批后正式向徐明清本人和其亲属宣布：撤销“文革”中于1972年错定徐明清为叛徒的决定；恢复她的党组织生活和行政十级的待遇；恢复名誉。

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徐明清是否包庇江青也进行了复查。1982年7月7日发布的《复查结果》指出：“经中央组织部核实，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泾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材料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她自由的当时，即申明推翻了。”并明确指出：“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注5·4·12）。终于纠正了徐明清的冤案（注5·4·13）。

然而，宣布徐明清“自首叛变”、说她“包庇”江青并为江青“作假证明”的，是全国上下人人皆知的中央文件，但为徐明清平反却仅限于很小范围，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究其原因，就是党中央不能公开否定中发（77）10号文件，不能实事求是地承认为打倒江青而制造了新的冤案；徐明清把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告上法庭（注5·4·14），根子也是中共中央没有对该中央文件的诸多不实之词公开否定。

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冤假错案难以尽数，唯有老干部的冤假错案绝大多数得到平反，而普通干部及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则长期无人过问，甚至告状无门。文革后发生的冤假错案也同样如此，前述徐明清冤案得以平反，原因在于她不但是行政十级的老干部，而且是曾和毛主席过从甚密的老革命王观澜（注5·4·15）的妻子；但晏章炎、李仲公的冤案就至今无人过问。更不用说象“记录在案”这类范围广泛的“不戴帽子”、“内部控制”、因而本人并不知觉的冤假错案了。

文革后的冤假错案并不少。兹再举出发生在影响较大而且算是“名人”身上的两个典型冤案。

一个是张钦礼的冤案。

在焦裕禄（注5·4·16）担任河南兰考县委书记期间，张钦礼是县长、县委副书记，鼎力支持和协助焦裕禄改变兰考面貌；在此之前，张钦礼就曾因说真话、批评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注5·4·17）带头搞浮夸，而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批斗了八个月。焦裕禄去世后，在“四清”运动中张钦礼又被停职清算半年多。文革开始后的1967年2月，当年焦裕禄的得力助手、提拔的干部、树立的先进典型，甚至焦裕禄结交的农民朋友，都遭到迫害，不到一个月时间逮捕1200余人！张钦礼被关押半年多，游斗一百多场；是周恩来总理点名才使他恢复自由，担任了兰考县革委会主任。但两年后又被省委撤职、软禁。直到“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又一次过问，张钦礼才再次获得自由并担任了兰考县委第一书记。

张钦礼担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六年，集中精力领导兰考人民完成焦裕禄生前的遗愿——继续除三害（注5·4·18）。六年中，兰考县粮食产量达到三亿两千多万斤，人均80

0斤，家家有余粮，是解放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兰考也由老缺粮县，到1976年，已上缴给国家3000万斤粮，100万斤皮棉，80万斤油料。

然而，由于兰考“捍卫焦裕禄司令部”所参加的开封“八二四”曾被周总理宣布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注5·4·19），张钦礼自然而然地成了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也因而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开展的“揭批查”的对象。当时负责河南省清查运动的是省委书记戴苏理（注5·4·20），“张钦礼被捕前几天，戴苏理把他叫到省委，威逼他揭发刘建勋（注5·4·21）、纪登奎（注5·4·22），并作检查，否则，矛盾的性质就要转化”；1978年10月16日，张钦礼在水利工地上被捕，1979年12月2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此案所涉及的清查对象有4000多人。其中120人判刑，其他或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或降级下放，或兼而有之。1990年5月20日，张钦礼提前半年多被释放；出狱后既无党籍，又无公职，也无基本生活保障，靠老伴儿照顾、儿女赡养。

身为省委书记的戴苏理竟公然要张钦礼“揭发”刚刚卸任第一书记但还是省政协主席的刘建勋和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并在制造了张钦礼大冤案后节节高升，担任了辽宁省委书记，还成了第十二届中央委员，联系到纪登奎、刘建勋后来被罢黜的事实，不能不怀疑戴苏理背后有大人物的指使和支持。

张钦礼于2004年5月7日去世。这样一位已经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老人，兰考十万群众自发地为他举行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囚徒荣归”的葬礼。兰考县城万人空巷，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两旁、农家田埂地头，群众为张钦礼摆的祭品是一碗碗清水，是杂面窝窝头，赞扬他为官一生，两袖清风；怀念张钦礼在贫困饥饿的上世纪60年代，和焦裕禄结伴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生出希望。多年后，张钦礼的墓地周围已成一片碑林；六十多块纪念碑、感恩碑的立碑者，不仅来自兰考和河南其他县市，也有来自山东、河北、上海的，甚至有来自台湾的。虽然张钦礼冤案至今未平反，但人民群众的悼念已经为他树立起一座丰碑，迫害他的人，企图否定焦裕禄这个“县委书记的榜样”的人，其丑恶灵魂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注5·4·23）

另一起是李庆霖冤案。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他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中屡遭苦难的状况。信寄出4个多月后的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亲笔给他回信，并给他寄了300元人民币。随即李庆霖的名字全国家喻户晓。

李庆霖敢于与命运抗争。他遭遇儿子上山下乡中的困难，曾向儿子下乡的公社党委、莆田县革委会、莆田地区有关部门反映，但毫无结果；也曾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却石沉大海；迫不得已，才冒险“告御状”，给毛主席直接写信。

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后的当年六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3）21号文件，把李庆霖的信和毛主席的回信印发到公社、街道，传达到全体上山下乡知青和广大群众；李庆霖“告御状”促使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和全面调整知青政策，直接使全国两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包括回乡的知识青年）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随着中共中央文件的贯彻落实，李庆霖成了全国知青及其家长心中的神圣人物。因为他为广大知青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并反映到中共中央，引起高层震怒；各地开始对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进行大力打击，并查处贪污挪用知青安置经费、建房材料及走后门等行为。李庆霖“告御状”，暴露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阴暗面，使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得到解决，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此后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转折，实际上使这一运动从高潮走向终结。

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本人的政治地位也不断上升，先是担任所在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后又任县知青办副主任、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1974年任省高招办的副组长，1975年被推举为四届人大常委，1976年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李庆霖和张铁生（注5·4·24）一样，也被树为“反潮流”的典型人物，卷入政治漩涡。

粉碎“四人帮”后，李庆霖由于曾积极支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原因，被视为“四人帮”的“小爬虫”，当年11月就被隔离审查，在莆田当地及福州等地，先后召开百多场批斗会进行批斗，曾多次昏倒在地；审查期间，李庆霖家被翻箱倒柜，所有文件、材料、笔记本，包括毛主席给他的复信、国务院给他的任命书都被查抄，至今下落不明。1977年11月，李庆霖被正式宣布逮捕，又过了1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送他到武夷山脚下的崇安劳改场关押改造。1986年南平地区中级法院给予减刑到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李庆霖被隔离审查后，其妻也被株连，开除公职并戴上“反革命”帽子，三年后才予平反，但直到去世也未恢复公职。李庆霖1994年3月提前出狱，虽获得了自由，但等待他的却是贫病交加的生活窘状，不仅没有经济收入，而且受帕金森、脑萎缩、肺气肿、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扰。他和老伴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被迫找到县领导反映自己的困难，才领到每月210元困难救济费勉强度日（后增加到每月300元，习近平任省长时又增加到每月500元）。

2004年2月19日，李庆霖病逝。2006年清明节，他的子女为他新拓了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毛主席给他的那封复信：

“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李庆霖，虽然曾经被捧为“反潮流”英雄，但这只是“四人帮”所控制的宣传机器别有用心地炒作；他虽然也曾支持反击“右倾翻案风”，但这毕竟是响应当时中共中央的号召；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竟然被判处无期徒刑！即使后来减刑，李庆霖也蹲了十七年大狱。与四人帮十名主犯比较，李庆霖的刑期高于姚文元的二十年和其他六名主犯的十六至十八年，与王洪文（无期）一样，只低于江青和张春桥的“死缓”；无可置辩，这显然是一起冤案。

在李庆霖遭难直至2004年去世的近30年中，唯一让李庆霖感到欣慰的是，全国两千万知青及家长大多没有忘记他。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去武夷山旅行的北京知青、上海知青听说李庆霖就在附近的劳改农场服刑，纷纷买了水果、糕点，走十几里山路专程去探望他，诚恳地感谢李庆霖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在李庆霖坐牢和出狱后，不少老知青想方设法找到他或打电话给他，有话语安慰的，也有寄钱送物的，这是他独有的一笔精神财富。他的名字已经永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联系在了一起。（注5·4·25）

总之，文革后的共产党，主流思维并没有根本变化，口头上说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仍然是阶级斗争模式，仍然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矛盾；许多情况下仍然按照政治需要处理实际问题，再加上一些当权者以个人恩怨挟私报复、干预案件，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不断制造新的冤假错案。

注释：

注5·4·1：不给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五名“右派分子”“改正”，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万余人，1978年后绝大多数予以“改正”，极少数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级5人，分别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注5·4·2：不为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挨整的刘伯承、粟裕平反，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刘伯承被冠以“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粟裕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文革后长期不予平反。直到1986年，刘伯承逝世后才在悼词中指明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粟裕虽在1979年就提出平反要求，但直到他逝世十年后的1994年12月25日，才在刘华清、张震署名的《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中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注5·4·3：见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载《党史资料研究》1992年第六期

注5·4·4：引自《邱会作回忆录》

注5·4·5：见孟东：《诬告贺龙的几封信》，2010年9月29日，《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

注5·4·6：见李幼华：《李仲公上交贺龙两封信的前前后后》，载《文史天地》2009年第11期

注5·4·7：李仲公在自己最早留存下来的两封信录稿旁加注文字曰：“这两封亲笔信已于本年四月初交参事室造反队张沅、秦萍两同志通过联络员转呈周总理”（见李芳：《李仲公“伪造贺龙信件”之疑》）

注5·4·8：见李芳：《李仲公“伪造贺龙信件”之疑》，载《文史天地》2013年第12期

注5·4·9：见罗美元：《李仲公陷害贺龙始末》，载《湘潮》2010年第5期

注5·4·10：童小鹏（1914·9·20—2007·7·18），文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福建长汀人。193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注5·4·11：徐明清（1911·5—2008·11·1），女，王观澜之妻。文革时为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处副处长。浙江临海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后任农业部教育局顾问。

注5·4·12：见1982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案件复查通报》第1号

注5·4·13：事实经过见东平、王凡：《徐明清与江青关系的事实真相》，载《党史博览》2007年第三期

注5·4·14：朱钟丽（1915·2—2014·2·8），女，王稼祥之妻，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时为王稼祥秘书，文革后为全国政协委员。在20世纪80年代初，朱钟丽以真名和笔名陆续出版了多本有关江青的传记，其中把徐明清说成是叛徒、与江青关系紧密的死党。徐明清被迫与朱钟丽对簿公堂。

注5·4·15：王观澜（1906·7·13—1982·1·19），浙江临海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农业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文革后为农业部顾问。



注5·4·16：焦裕禄（1922·8·16—1964·5·14），山东省博山县人。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底任河南兰考县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缺），为改变兰考贫穷落后的面貌呕心沥血，病逝后兰考上万群众披麻戴孝自发为他送葬。

注5·4·17：吴芝圃（1906·3·16—1967·10·19），河南杞县人。1925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省省长，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对河南在1959——1961年出现的“信阳事件”等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负有直接责任。

注5·4·18：除三害，风沙、内涝、盐碱，被称为兰考县的三大灾害。

注5·4·19：1967年7月25日，周恩来在京西宾馆接见河南支左部队的军官时说：“河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郑州的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

注5·4·20：戴苏理（1919·11—2000·1·22），山西省襄垣县人。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为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73年后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书记，副省长、省长，辽宁省委书记等职。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注5·4·21：刘建勋，见注5·3·26。

注5·4·22：纪登奎，见注5·3·26。

注5·4·23：详见陈健：《张钦礼一案的前前后后》，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七期

注5·4·24：张铁生，辽宁兴城人。1968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曾任生产队副队长。1973年参加大学招生考试时，在考卷背面给领导写了一封信。《辽宁日报》予以刊登并加了“编者按”，随后中央和各地报刊转载，张铁生成为“反潮流”的典型。文革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1年刑满获释。

注5·4·25：详见王学亮：《“告御状英雄”李庆霖的沉浮人生》，载《名人传记》2007年第九期；张玉钟：《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一期

□ 摘自《人间重晚晴——一个所谓红二代的人生轨迹》，明镜出版社，2017年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